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末。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中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階段，1980 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本特徵——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¹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 年 5 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479 頁。

導言

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興起與衰亡堪稱 20 世紀人類社會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從人類進入現代文明以來，關於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始終是世界歷史的基本主題。同時，從傳統帝國和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也一直世界歷史的另一主題。20 世紀的蘇聯歷史涵蓋了上述兩大主題，它既是一種作為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替代性選擇」的社會主義體制模式的開創者，又是在「世界革命」目標下建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聯盟」的實踐者。蘇聯的歷史開始於 1917—1922 年的社會革命和制度創設，終結於 1985—1991 年的制度變遷和國家重構。其中，蘇聯歷史的終結階段一般被稱作「蘇聯解體」。至今，蘇聯解體已經過去了三十餘年，作為對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研究已經具備了擺脫「歷史在場者」視野局限的認識條件，也能夠從歷史的沉澱中集聚起反映歷史運動本質性因素的史料，並通過對這些史料的整理和解讀，更為清晰地重現這段蘇聯最後歲月的歷史面相。

蘇聯解體歷史過程包含着「制度變遷」、「帝國終結」和「聯盟解體」三重含義，它們共同構成了廣義的「蘇聯解體」。具體而言，「制度變遷」過程顯示了列寧時期開創、斯大林時期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制度」——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及其派生的經濟體制如何深陷危機，而後在激進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中被否定，並由此動搖了聯盟國家體制的基礎；「帝國終結」過程顯示了二戰後建構的「社會主義陣營」（蘇聯的勢力範圍）和「經互會」、「華沙條約組織」（蘇聯行使帝國權力的主要機制）如何在蘇聯霸權的衰落和戰略思維的轉變中，由外而內地逐步收縮並最終消亡，與此同時蘇聯主動結束與美國和西方陣營的冷戰，從根本上消解了兩個體系對抗的國際戰略格局；「聯盟解體」則是上述兩個歷史進程交匯的最後結果，也就是表現在國家體制意義上的狹義的「蘇聯解體」，主要顯示了 1922 年建立的「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特殊的聯邦制國家（實際上的「類帝國」體系¹及其基礎結構——高度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國家），如何在 1985 年開始的「制度變遷」和「帝國終結」過程中，因其基礎結構的動搖和加盟共和國（尤其是作為聯盟主體的斯拉夫三國）獨立主權地位的獲得而被架空中央權力，繼而這些加盟國在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主導下又如何拋棄和分解了已經成為空殼的聯盟體制架構。總體上看，廣義的「蘇聯解體」顯示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內部邏輯和外部邏輯，這是兩條並行、交匯的歷史線索。從 1985 年 3 月到 1991 年 8 月，「制度變遷」和「帝國終結」的進程發展到了一個共同推動歷史性質變的時間節點。這時，1991 年 8 月 19—21 日發生的「八一九事件」突然加速了已經啟動的國家重構進程，並在短短的四個月內將其定格為無可逆轉的最終的「聯盟解體」。

如果說，「制度變遷」和「帝國終結」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統治集團在應對日趨嚴重的制度危機時主動選擇的「反危機」戰略路線，其目標是通過體制改革和戰略收縮使蘇聯走出危機困局，並演變為更具現代文明特質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麼，「聯盟解體」則是在改革過程中因釋放了舊制度的張力而不得不應對的國家體制危機及其結果。這並非改革的目標，卻是為追求改革目標而被迫支付的「計劃外」的代價，而正是這一涉及民族主義和大國地位的沉重代價中止了體制改革的進展，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體制改革的正面效應，使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等國至今蹣跚於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中途。

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研究成果 —— 12 卷檔案文獻集

¹ 蘇聯的國家體制和統治體系是一種特殊的類型，它具有繼承自沙俄的周邊擴張型殖民帝國傳統、現代聯邦制國家形式和雅爾塔體系賦予的國際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世界革命理念的超國家多民族共同體等多重屬性和特質。因此很難將其歸入一般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範疇。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因其武力干預東歐國家改革、鼓吹「有限主權論」的行為曾被稱作「社會帝國主義」。本書用「類帝國」概念旨在說明，蘇聯的統治體系是一個包含「外圍」（東歐、蒙古等勢力範圍控制區）、「邊區」（波羅的海、高加索和中亞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加盟共和國）、「核心」（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斯拉夫三國）等多層次治理系統的複雜的政治共同體，其統治形態類似歷史上因統治地域廣闊、統治對象多元而實施多層級治理的帝國。

《檔案文獻中的蘇聯最後歲月》¹按時間線索呈現了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根據文獻集提供的歷史線索和相關史料，我們可以勾畫出1985—1991年間蘇聯從改革伊始到最後解體的大致輪廓，並從中提煉出這一歷史過程所展現的演進邏輯。

目 錄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i
導 言	iv
第一章	001
制度危機 ——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史	
第二章	022
制度的改良與「帝國」的收縮 ——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一階段（1985.3—1988.5）	
第三章	071
制度的變革與「帝國」外圍的崩塌 ——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二階段（1988.6—1990.3）	
第四章	113
圍繞聯盟存廢的博弈 ——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最後階段（1990.3—1991.8）	
第五章	181
聯盟解體與「帝國」終結 ——從「八一九事件」到《阿拉木圖宣言》（1991.8—1991.12）	
結 語	228
關於蘇聯解體過程的若干思考	
附 錄	246
後 記	272

¹ 《檔案文獻中的蘇聯最後歲月》（1—12卷），未刊本，存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此檔案文獻集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蘇聯解體過程的俄國檔案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4ZDB062）的結項成果。關於文獻集的內容提要見本書附錄2。

第一章 制度危機

——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史

一

為了更全面地理解蘇聯解體過程的演進邏輯，在敘述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前，首先需要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體制的發生、制度的本質和特徵，以及作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緣起的制度危機作一個概述。

1985年3月11日，54歲的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此前三年間，蘇聯經歷了三位年邁的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的特殊政治生態，而這種政治生態的形成則是長期以來蘇聯模式體制慢性衰落、積弊難除、直至進入危機狀態的結果。因此，戈爾巴喬夫的當選，意味着蘇聯模式體制的自救已到了必須更新領導層，以進行必要的改革來應對危機的時候。

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體制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由奪取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創設的，是人類歷史上第一種付諸實踐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20世紀的歷史運動，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發生有其應對客觀歷史命題的合理性，並由此形成獲得社會認同的歷史根據。

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歷史根據首先來自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替代性選擇」的需求。發端於西歐地區的人類文明的現代化作為自然歷史進程充滿着人類社會固有的不平等。隨着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社會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動，傳統社會的等級秩序被資本主導的新的等級秩序所顛覆。在資本主義社會奠基階段，新的階級關係表現出比以往更尖銳的矛

盾。同時，西歐國家憑藉工業生產力的優勢，以殖民主義方式向全球擴張，建立了早期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從而將世界大部分地區強制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上述過程蘊含的種種「不合理」因素是激發批判資本主義和訴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歷史依據。馬克思主義就是其中最為徹底的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論，正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作為社會形態演進趨勢的「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紀中葉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時，尚未涉及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當時他們認為，西歐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將主導落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並通過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世界歷史進程」，為人類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共同的歷史前提。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¹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²可見，按照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理，以工業化為內涵的現代化是以資本主義的方式改造傳統社會的過程，只有在完成現代化（即建立現代工業社會）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向社會主義（即高於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歷史階段）進一步發展，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

大約從 1870 年代起，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社會主義與落後國家現代化的關係。這方面的思想後來被概括為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理論命題。該命題的具體提法出自 1881 年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草稿，³而這一思想在 1875 年恩格斯《論俄國社會問

題》一文中已經有明確表述。恩格斯指出，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在不同的外部條件下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其一，按一般規律，落後國家的傳統社會結構將不可避免地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中「趨於解體」，被改造為資本主義制度；其二，如果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尚未完成，而世界的先進地區——西歐已經「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那麼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帶動下，落後國家可以不再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¹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已經在理論上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落後國家現代化結合的思想，並希望俄國作為實踐這一思想的案例。但是，俄國能否跨越「卡夫丁峽谷」有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即西歐完成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82 年《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說：「假如俄國革命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²也就是說，俄國革命不可能單獨承擔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使命，俄國必須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帶動下才能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後來，恩格斯在 1894 年為重印其《論俄國社會問題》而寫的跋語中進一步總結了他和馬克思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指出：要避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苦難，「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作出榜樣和積極支持。只有當資本主義經濟在自己故鄉和在它達到繁榮昌盛的國家裏被戰勝的時候，只有當落後國家從這個實例中看到『這是怎麼回事』，看到怎樣把現代工業的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來為整個社會服務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這些落後國家才能走上這種縮短的發展過程的道路」。因為如果沒有來自先進國家的引導和世界革命的大環境，「要處在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來解決只是處在高得多的發展階段的社會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255 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206 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 438 頁。原文是：「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享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625-626 頁。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231 頁。

能的」。與此同時，恩格斯明確指出，19世紀末的俄國已經失去了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歷史機遇，因為俄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已經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遭到了破壞，而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尚未到來。但是，由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帶動落後國家的非資本主義發展，或縮短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行程的規律依然存在，它「不僅適用於俄國，而且適用於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發展階段的一切國家」。¹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設想無疑啟迪了列寧一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在投身於俄國革命的實踐中，力圖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轉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創設，即便在不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條件下，也儘可能縮短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契機就是通過政治革命奪取政權，用俄國革命的勝利引爆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完成俄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正是這一理論邏輯，促使列寧在1917年特定的政治形勢下抓住革命的機遇，將落後的俄國推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1917年革命發生在20世紀初的俄國，就其客觀內容而言，原本屬於從1905年開始的、以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為使命的民主革命的範疇，是為俄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清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中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改變了俄國革命的性質，使十月革命成為20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起點。

然而，1917年俄國革命畢竟不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理論的實踐驗證，因為就俄國革命本身的歷史條件而言，遠低於馬克思理論所設定的歷史前提。正因為如此，領導俄國革命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直至1917年革命發生也不認為自己是世界革命的引領者。列寧在說服黨內同志抓住革命機遇、奪取政權時，曾反覆申明，落後的俄國作為帝國

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可以率先突破，但世界革命的前途必須由先進的西方國家引導。列寧在十月革命一周年談到俄國革命勝利的原因時說，由俄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決不是由於俄國無產階級有什麼功勞，也不是由於它比別人先進，相反地，正是資本主義的特別軟弱和落後，以及特別逼人的軍事戰略形勢」，才給革命的發動提供了機遇。¹所以，在俄國十月革命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只是獲得了奪取政權的歷史機遇，新制度的建構尚待世界革命的成功。當布爾什維克黨依靠軍事力量、經過國內戰爭鞏固蘇維埃政權後，世界革命卻並未如預期而至。這一局面是新政權面臨的第一次「合法性危機」（實踐與理論的背離）。因此，列寧必須向黨內同志和社會民眾說明，在這種形勢下，落後的俄國是否還具有實現「替代性選擇」歷史使命的可能。這也就是列寧晚年理論工作的重點所在。列寧晚年對十月革命及其開始的社會主義實踐作出了新的理論詮釋，其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

其一，對俄國社會發展階段的界定。按「世界革命」理論邏輯，俄國作為革命的先行者，將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獲得超常規發展的可能性，即從一個比較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出於這樣的思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寫的《國家與革命》中已經設想了一幅社會主義實踐的藍圖，並在奪取政權後進行了實踐的嘗試，這就是開端於1918年春、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達到極端的所謂「直接過渡」。列寧認為，導致「直接過渡」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世界革命沒有按預期到來，致使蘇維埃俄國不得不陷於孤軍突進的境地，而在一個落後的、小農佔優勢的國家裏，單憑自己的力量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退卻，退到社會發展的現實基礎上。列寧說，這好比登山，「假定有一個人，攀登一座還沒有探測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502-503頁。

1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頁。